

从特殊音变看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多功能虚词“等”的来源*

——兼论苏沪、宁波方言多功能虚词“搭”的非同一性

盛益民

(复旦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摘要: 文章基于增生鼻音这种虚词的特殊音变模式, 探讨了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多功能虚词“等”的来源。文章认为, 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的多功能虚词“等”并非从给予动词或者等待义动词“等”发展而来, “等”只是个记音字, 是传教士文献中另一个多功能虚词“搭/得”增生鼻音尾的结果。同时, 文章还认为宁波方言的多功能虚词“搭/得”和苏沪吴语中与之对应的“搭”只是偶然同音, 并非同源成分。

关键词: 宁波话; 传教士文献; 多功能虚词; 苏沪吴语; 等; 搭/得; 语素同一性

中图分类号: H1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79 (2018) 04-0053-08

doi: 10.3969/j.issn.1000-2979.2018.04.009

0 引言

语法化过程中, 常常会伴随形态、音系方面的变化, Bybee et al. (1994) 甚至还提出了“形-义共变”(coevolution of meaning and form) 这一著名的假说。^{[56]20} 学界关于语法化音变的相关研究以及汉语语法化过程中的音变现象, 请参李小军 (2017) 的详细论述。^[14] 伴随语法化而产生的音变, 往往是不合常规音变的特殊音变。不过, 伴随语法化而产生的特殊音变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因此探究这种特殊音变模式也是历史句法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们发现, 汉语方言中存在一种虚词或高频词增生鼻音的特殊音变模式 (详参 2.1 节), 这一现象是之前学界较少关注的。本文打算以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的多功能虚词“等”的来源为例, 具体说明这一重要的特殊音变现象。

现代宁波市区方言用“拨” pe^7 ^①表给予动词、允让动词和被动标记, 用“搭” te^7 表受益者标记、受损者标记、伴随者标记、等比对象标记和并列连词等, 例如 (引自汤珍珠等 (1997), 括号内注释为笔者所加, 下同):^{[35]297, 305}

- (1) 该本书拨我仔嚟。这本书给我吧。(给予)
- (2) 该事体再拨我付付看。这事再让我想想看。(允让)

- (3) 手骨拔蛇咬一口。手被蛇咬了一口。(被动)
- (4) 我搭依梳头。我给你梳头。(受益者)
- (5) 东西也搭我拷腐嚟。东西也给我打碎了。(受损者)
- (6) 侬事先应该搭渠讲清爽。你事先应该跟他讲清楚。(伴随者)
- (7) 儿子搭阿爹一样长嚟。儿子跟父亲一样高了。(等比对象)
- (8) 我眼睛有色盲个, 红搭绿老老要看错。我眼睛有色盲, 红和绿经常要看错。(并列连词)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宁波鄞州瞻岐、北仑柴桥、舟山定海、岱山等旧宁波府属地。例如定海也是用“拨”表给予动词和被动标记;^[5] 用“搭”表受益者标记、受损者标记、伴随者标记、言谈对象标记、等比对象标记和并列连词等, 例如 (引自徐波 (2004)):^[41]

- (9) 渠每回搭人家帮忙蛮尽心个。他每次给别人帮忙都挺尽心的。(受益者)
- (10) 我偶凑搭依弄痛个, 对侬弗起啊。我是不小心把你弄痛的, 对不起你哟。(受损者)
- (11) 渠比比叨叨来的寻直轧头, 时介付搭我造孽。他骂骂咧咧的总是想挑起事端和我吵架。(伴随者)
- (12) 渠只弗来, 来来我搭其讲。就怕他不来, 来的话我就和他讲。(言谈对象)
- (13) 我脚底里垫瓜砖头, 正好搭依一字过平。我脚底下垫块砖头, 正好和你一样高。(等比对象)

*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汉语方言论元性强调代词的功能、类型和演变”(项目编号: 15YJC740066)、复旦大学亚洲中心 2017 年度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境内语言语法化词库建设”(项目编号: 15ZDB100) 的资助。感谢林素娥老师惠赐《宁波方言便览》电子版, 感谢 Hilary (曹茜蕾) 教授和王健教授惠赐未发表的文稿。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姚远老师提供金山张堰、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贾沈朱提供松江石湖荡、海南师大硕士研究生李晨提供象山丹城的方言语料。本文写作及修改过程中, 承蒙刘丹青、汪维辉、石汝杰、陶寰、花东帆、朱佳蕾、王芳、王非凡等师友提出宝贵意见, 《语文研究》匿名审稿专家也给本文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谨此一并致谢。

(14) 渠拉阿爹每日讨香烟搭老酒喫。他们的爹每天要讨烟抽和讨酒喝。(并列连词)

林素娥(2015)指出,在清末的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另有一个多功能虚词“等”,其功能与“搭”基本相同。^[16]根据现有文献及笔者的实地调查,这个多功能虚词在现今的旧宁波府属地方言中并未保留。因此这个“等”的来源、消失及其在宁波话介词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等问题都需要着重探讨。林素娥(2015)等对此已有所考察,^[16]但其解决方案还有一些可商之处(详参1.2节),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下文的宁波方言专指宁波市区方言,其与旧宁波府所辖鄞县(今鄞州区)、旧慈溪、旧镇海(大致是今镇海区大部加北仑区)、奉化、象山、旧定海(大致是今舟山市定海区加普陀区)、岱山、嵊泗等县的方言同属吴语太湖片甬江小片。本文所使用的材料,除标记出处的,均由笔者调查所得。

1 多功能虚词“等”的功能及其来源

1.1 多功能虚词“等”的功能

林素娥(2015)指出,19世纪以来,在包括《马太福音书》(以下简称《马太》)(1853)、《约翰福音书》(1853)、《宁波方言字语汇解》(以下简称《汇解》)(1876)、《宁波土话初学》(以下简称《初学》)(1857/1868)、《宁波土话旧约·创世纪》(以下简称《创世纪》)(1876)、《宁波方言便览》(以下简称《便览》)(1910)^②等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有一个与现代宁波话“搭”对应的多功能虚词,在罗马版文献中记作 *teng*, 汉字文本中写作“等”。^[6]

本文对林文所引材料重新进行了归纳,发现这个多功能虚词“等”在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有如下功能:

第一,引介动作行为的受益者,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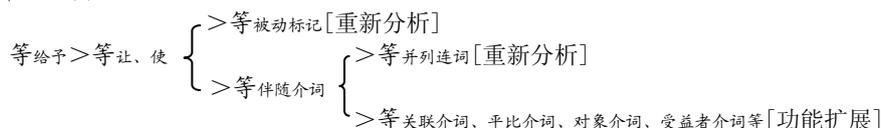
(15) *teng ngô' ma'* 你等我买。你为我买。(《汇解》185页)

(16) 唔等我刺鞋底,我等唔缝棉袄。你给我做鞋底,我给你缝棉袄。(《便览》73页)

第二,引介动作行为的伴随者(相当于林文的引介协同对象和介引关联对象),表示动作共同、协同的对象,例如:

(17) 若有人勉强你走一里,也好等其走两里。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你也可以跟他走两里。(《马太》5:41)

(18) *teng ngô 'soh-go siang-ken'*? 等我啥个相干? 跟我有什么相干?(《汇解》87页)



“等”可以表给予义是林文论证的出发点,尽管林文从吴语历史文献和方言共时状况两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但是对“等”的演变,我们认为其

第三,引介言谈的对象,例如:

(19) *ngô iao teng ng kông*. 我要等你讲。我要对你说。(《汇解》443页)

(20) 我已经再三等其讲过。我已经再三跟他讲过了。(《便览》48页)

第四,引介等比的对象,即用于等比结构中引介比较的对象,例如:

(21) *ng teng Fah-lao ih-yiang-go*. 你等法老一样个。你跟法老一样的。(《创世纪》44:18)

(22) 告诉其等告诉我是一样个。告诉他跟告诉我是一样的。(《便览》49页)

第五,用作并列连词,例如:

(23) 善人等恶人天生成是仇敌。善人和恶人天生是仇敌。(《便览》48页)

(24) 好亲眷肯关照等照应。好的亲戚愿意关照和照应。(《便览》164页)

林文还统计了《初学》《创世纪》《便览》三种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虚词“等”的功能分布,我们根据本文的分类重新对其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表1 三种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虚词“等”的功能分布

	《初学》	《创世纪》	《便览》
受益者标记	3	24	20
伴随者标记	14	176	32
言谈对象标记	7	232	36
等比对象标记	1	2	8
并列连词	50	207	34
总计	75	641	130

从表1可以看出,在《初学》《创世纪》《便览》三种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等”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多功能虚词。

1.2 多功能虚词“等”的来源方案及存在的问题

关于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多功能虚词“等”的来源,学界已经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第一种解决方案,认为“等”就是本字,反映的是“等”的多功能语义模式。

上一节已经指出,在《便览》等有汉字的传教士文献中,以上多功能虚词正写作“等”。林素娥(2015)也认为该多功能虚词的本字就是“等”,而且认为“等”早期是给予动词(但这种功能在传教士文献中并未保留),其各种虚词用法都是从给予动词发展而来的,以下是林文为其构拟的演变路径:^[16]

说法无论是在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先来看吴语历史文献的情况。林文引用郑伟

(2007)一文中讨论《绣榻野史》的例子,认为早期吴语中“等”有给予义,例如:^[55]

(25)你肯再把阿秀等我弄一弄罢。

(26)我怕你病,安排药来等你吃,你倒要自死。

这两个例子的句式均非双及物构式,即不是给予动词出现的典型结构,因而对于句中“等”的用法也还有不同的理解。如刘华丽(2014)就认为:例(25)是广义处置式,不能从中推导出“等”有给予义;而例(26)是一个兼语句,“等”仍可以理解为表允让义的致使动词。^[20]

此外,在早期的其他吴语文献中,也没有发现“等”表示给予动词的例子。石汝杰、宫田一郎(2005)在“等”的条目下只列出了表“让、使”的用法,例如:^{[29][127]}

(27)我今日勿勿要开啥牢店哉,且等耳朵里静办勾日把介。(《报恩缘》一五出)

(28)明朝要到上海去住格两日,……等倪散散心看,勿然是坐勒屋里向,倪头脑子也涨格哉。(《九尾龟》二四回)这说明早期吴语文献中有“等”表致使义的例证,但是并没有表给予义的例证。

再来看方言共时状况的情况。林文引用湖南邵东等地的方言证明“等”可以表示给予动词,^[16]但是这样的材料只能作为旁证,我们并没有在现今的吴语中找到“等”表给予义的例证。^③此外,林文还引用了浙江金华话、衢州话的材料,^[16]但是这两个方言中的“等”只可以表示允让、被动义,都没有表给予义的用法。同时,汉语史文献中也没有“等”单独表给予义的例证。

由上可见,无论是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没有确切证据能证明吴语中存在表示给予义的“等”。

如果排除掉“等”可以表示给予义,那么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等”的各类虚词用法就只能从等待义发展而来,但是这并不能解释相关的后续演变。何忠东、李崇兴(2004),何亮(2005),龚波(2010),刘华丽(2014),曹茜蕾(2015)等都已经证明,汉语方言中存在“等待>允让>被动”的演变路径,^[8, 7, 6, 20, 57]早期吴语及金华、衢州等地方言“等”表示被动的用法,正是等待义经由允让义发展出的被动标记功能。^④^[20]但是,现在仍没有可靠材料能证明等待义动词、致使动词等可以发展出受益者标记、伴随者标记等功能。^⑤

综上,如果认为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写作“等”的多功能虚词其本字就是“等”,就无法解释其具体的演变。

第二种解决方案,认为“等”的本字不是“等”,而是另有来源。

林素娥(2015)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为“等”的本字是替代义动词“代”。^{[15][181]}但是,在《广韵

中“代”是去声代韵定母字,而“等”是上声等韵端母字,两者的声母有清浊之别,韵母有阴声韵与阳声韵的差异,声调也不相同,语音上差别较大。因而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的多功能虚词“等”恐怕也不是从“代”发展来的。

当然,本文赞同第二种解决方案的研究思路,即“等”的本字是另有来源的。下面将在增生鼻音这种虚词特殊音变模式的基础上,论证“等”并非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多功能虚词“等”的本字,“等”只是一个记音的训读字,其读音来源于传教士文献中另一个虚词“搭”,是“搭”增生鼻音尾这一特殊音变的结果。

2 从增生鼻音看“等”来源于“搭”

2.1 增生鼻音:虚词的一种特殊音变模式

潘悟云(2002)《汉语否定词考源——兼论虚词考本字的基本方法》从弱化的角度,对虚词声母、韵母、声调三个方面的特殊音变进行了考察,^[24]是探讨虚词特殊音变模式的一篇力作。

本文认为增生鼻音也是汉语虚词或高频词一种常见的特殊音变模式。所谓增生鼻音,就是非阳声韵的词增生出鼻音尾或者鼻化的过程。张敏(2011)《汉语方言双及物结构南北差异的成因:类型学研究引起的新问题》一文已经提出,口语中高频使用的非阳声韵字偶有鼻音化的特殊演变。^⑥^[50]刘丹青(2017)也提到,北京土话“比”“起”分别有“秉”“擎”的同义说法,很可能是鼻韵尾化的一种特殊音变现象。^[19]

虚词或高频词增生鼻音尾的现象在吴语中较为常见,在北部吴语中可以找到好几组平行的例证,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给予动词、被动介词“拨”。

北部吴语表示给予动词、被动介词主要使用“拨”,而根据胡明扬(1992),海盐话的“本”pen³具有给予动词、接受者标记、被动标记等功能,^{[12][60-61]}张敏(2011)认为“本”是其他吴语多功能词“拨”增生鼻音尾的结果。^[50]金山张堰方言的“本”pen³、平湖方言的“本”pen³、萧山方言的“板”pẽ³等,^[4]也都是“拨”增生鼻音尾或者鼻化的结果。而松江方言与“拨”对应的虚词则既可以说 ʔə⁷,又可以说 ʔəŋ³,^[44]其阳声韵形式 ʔəŋ³来源于入声韵形式 ʔə⁷增生鼻音尾,两者保存了共时平面同时具有两种读音的鲜活例证。

第二,受益者标记、伴随者标记“忒”。

苏沪吴语中,表示受益者标记和伴随者标记普遍使用“忒”tʰə⁷,钱乃荣(2003)等均认为它是“替”促化的结果。^{[22][225]}根据许宝华、陶寰(2015),松江方言表示受益者标记、伴随者标记等功能的介词有 tʰə⁷、tʰəŋ³两种读音,^[44]我们认为 tʰəŋ³正是

tʰəŋ⁷增生鼻音尾的形式。^⑦

第三, 伴随者标记“克”。

吴语中表示伴随者标记使用“克”, 主要分布于吴江靠近嘉善的黎里、芦墟、^[17]松江石湖荡、金山张堰、嘉善魏塘、平湖等地, 其中松江石湖荡有 kʰəŋ⁷、kʰəŋ³两种读音, 而金山张堰只使用“肯”kʰəŋ³(<*kʰəŋ³)表示受益者标记、伴随者标记和并列连词等, 例如:

(29) 奴肯渠开门。我替他开门。(受益者)

(30) 奴肯渠讲: 张三肯李四侬是金山人。我跟他讲: 张三和李四都是金山人。(伴随者、并列连词)

平湖当湖为“克”kʰəŋ⁷、平湖独山港为“肯”kʰəŋ³, 阳声韵的“肯”来源于入声韵的“克”增生鼻音尾。地理上的不同也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此外, 吕四方言表示持拿动词和处置介词的“拿”有 na³³⁴、nã³³⁴两种读音,^{[21][142]}鼻化一读也是鼻音增生的结果。潘悟云、陶寰(1999)指出, 南部吴语某些介词之后也会发生类似的鼻音增生现象, 例如表示“和”的虚词: 丽水音 tʰi, 庆元音 tʰieŋ; 表示差比的“比”: 丽水音 pi, 庆元音 ɬieŋ。^[25]类似的现象也见于副词等其他类虚词, 如绍兴柯桥的“特为故意”, 既可以说成 deŋ¹³fue³³也可以说成 deŋ¹¹fue³³、“越加更加”既可以说成 fioŋ¹³ko³³也可以说成 fioŋ²³ko³¹。

吴语之外, 也有一些类似的例证。王双成(2014)认为, 青海西宁、门源等多地“这么、那么”中“么”读 mən, 是鼻音韵尾增生的结果。^[37]江苏泰州方言“我”音 ũ、“你”音 nĩ, 都是鼻化韵, 袁丹(2014)认为它们都是鼻音增生的例证。^[46]汪化云(2016)认为江西九江方言中表处置标记的“班”pan 来自于“把”pa,^{[38][302]}若此则也是鼻音增生的一个例证。李小军(2017)指出, 湖南邵阳方言语气词“咱”“啊”可以通过增生鼻音的方式来产生功能的分化。^[14]当然, 汉语方言中类似的更多例证, 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⑧

2.2 “等”来自多功能虚词“搭”的鼻音增生

我们认为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的多功能虚词“等”teng 来源于宁波话另一个常用虚词“搭”teh 的鼻音增生, 下面具体论证。

林素娥(2015)指出, 早期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还有一个与“等”功能类似的多功能虚词“搭”。^{[15][16]}根据笔者的统计, 《便览》中虚词“搭”一共出现了9次, 分别用作受益者标记、伴随者标记、并列连词等, 例如:

(31) 你搭我带一封信去。你给我带一封信去。(受益者)

(32) 我搭一个朋友品股资做個。我跟一个朋友合伙做的。(伴随者)

(33) 今夜脱了鞋搭袜, 得知明朝着弗着。今夜脱了鞋和袜, 不知明天穿不穿。(并列连词)

• 56 •

此外, 现代宁波话“搭我”还可以用作命令标记, 这是“等”在传教士文献中并未出现的功能, 例如:

(34) 你要搭我快点做好! 你给我快点做好!

洪波(2004), 洪波、王丹霞(2004)等文指出, 普通话的命令标记“给我”是在受益者标记“给”与“我”结合并词汇化后发展而来的。^{[9][10]}宁波话的“搭我”也是如此。

对于“等”和“搭”的关系, 林素娥(2015)认为“等”是宁波话固有的成分, 而“搭”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上海话与宁波话的密切接触而从上海传入宁波的。^{[16][15][142: 180-181]}

虽然在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 “搭”出现频率远比“等”低,^{[16][180]}但是我们认为“搭”并非受上海话影响的结果, 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早期宁波话的“搭”与苏沪吴语的“搭”并不同音。《便览》中“搭”的汉字文本虽然写作“搭”, 但读音却都是 teh, 用国际音标为 teŋ⁷或 təŋ⁷。徐通锵(1993)指出, 早期宁波话有 eŋ、aŋ 两韵的对立, 不过在《汇解》时代不少字就已经有 eŋ、aŋ 两种读音了;^[43]到赵元任(1956/1928)的记录中, 这两韵已经完全合并了。^[52]考察发现, 与宁波话“搭”有同源关系的成分在宁波地区广泛存在, 如旧慈溪三七市(今属余姚)为“得”təŋ⁷、^[26]象山丹城为“得”teŋ⁷、^[45]舟山定海为“搭”teŋ⁷,^[41]其中旧慈溪三七市、象山丹城等地仍有 eŋ/əŋ、aŋ 两韵对立的现象, 例如象山丹城“得 teŋ⁷≠搭 taŋ⁷”。这进一步说明早期宁波话“搭”的读音是 teŋ⁷, 文字上写作“搭”, 反映了 eŋ、aŋ 相混的过程(下文写作“搭/得”), 它与苏沪吴语的“搭”并不同源, 这个问题第3节还会有进一步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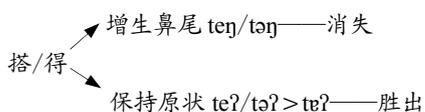
第二, 林素娥(2015)已经指出, 早期上海话传教士文献中“搭”并无表受益者标记的功能, 这一功能受苏州话影响的结果。^[16]而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搭/得”却有表受益者标记的用法, 如果说“搭”是苏州影响上海后再影响宁波的结果, 那就会在时间上存在不可调和之处, 同时我们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苏州话对宁波话产生过直接影响。

第三, 与宁波话“搭/得”有同源关系的成分在宁波地区广泛存在, 如旧慈溪三七市、象山丹城的“得”, 其功能比宁波话更加发达(具体请参3.2节)。如果宁波市区话的“搭/得”是受上海话影响的结果, 那宁波周边其他地区的情况就没法解释了。

综上, 我们认为, “搭/得”是宁波话早期固有的成分, 宁波周边地区方言的情况可以为其提供很好的支持。“搭/得”正是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多功能虚词“等”的直接源头, “等”teng 是“搭/得”teh 增生鼻音尾的结果, 两者在语音形式上的对应是其很好的体现。^⑨

那如何解释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等”远多于“搭/得”的事实呢？我们认为，当时可能发生“搭/得”增生鼻音尾为“等”的只是现今宁波市区附近的一小块区域，传教士又恰好主要活动于这一区域，所以这种形式被记录了下来，而这个区域周边的广大地区则仍然广泛地使用“搭/得”。伴随着城市范围的扩大和周边人口的大量涌入，在宁波市区方言中，周边的“搭/得”又逐渐占了上风，并最终淘汰了“等”这个创新形式，所以在赵元任（1956/1928）的记录中我们就已经看不到“等”的痕迹了。^[53]至于“搭/得”胜出的原因，我们认为可能与上海等地的方言接触确实有一定的关系，接触促进了“搭/得”在择一过程中的胜出。

“搭/得”在宁波市区的语音创新及不同成分之间的竞争过程可以总结如下：



3 苏沪、宁波方言多功能虚词“搭”的非同一性

苏沪吴语的“搭”与宁波话的“搭/得”，读音相近、功能类似，因此学界多认为两者具有同源关系。我们认为两者并无同一性，它们来源不同，是不同的语素。下面分别讨论。

3.1 苏沪吴语的“搭”及其来源

苏沪一带用“搭”的方言点以苏州为中心分布，主要是苏州、常熟、无锡、上海等地。^⑩

苏州话的“搭”具有受益者标记、伴随者标记、言谈对象标记、等比对象标记、比拟标记、并列连词等多种功能，例如（引自石汝杰（2000））：^[27]

(35) 耐做生活还忙杀勒浪，再要搭我煎药，实在对勿住。你干活已经够忙的了，还要为我煎药，实在对不起。（受益者）

(36) 阿记得我勒学堂里搭耐打相打个日脚？还记得我在学校里跟你打架的日子吗？（伴随者）

(37) 哀桩事体晏歇搭耐说。这件事待会儿跟你说。（言谈对象）

(38) 我年纪轻个辰光，搭耐差勿多，也喜欢游泳个。我年轻的时候，和你差不多，也喜欢游泳。（等比对象）

(39) 听着獐个消息，赛过搭中仔奖一样开心。听到这个消息，就跟中了奖一样高兴。（比拟）

(40) 侬爷搭侬兄弟一淘到苏州来哉。我父亲和我弟弟一起到苏州来了。（并列连词）

关于苏州话多功能虚词“搭”的具体演变路径，目前学界尚有争议。刘丹青（2003）认为苏州话并列连词“搭”是从“连带、连同”义动词发展出来的，之后可以加体标记“仔”，是动词用法的遗留，而其伴随介词用法来源于动词义或者并列连词功能。^[18]吴福祥（2003）、赵川兵（2010）则认为“搭”经历了“‘连带、连同’义动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

的单向性演变。^[39, 52]不过，江蓝生（2012）和吴福祥（2017）已经指出汉语方言中的确存在并列连词发展出伴随介词的现象。^[13, 40]抛开争论，苏州话的“搭”最初由“连带、连同”义动词发展而来是学界的共识。

而受益者标记等功能是伴随介词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刘丹青（2003）、郑伟（2017）指出，历史文献中，在晚明的《山歌》里“搭”只有并列连词和伴随介词的功能，到清初的《三笑》里才有受益介词、等比介词等功能，这些用法都是由伴随介词发展出来的。^{[18], [54]197-205}《山歌》中“搭”只有并列连词和伴随介词的功能，表明晚明时期的“搭”仍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另一个多功能虚词“听”^⑪在书中的出现频率远高于“搭”，而且可作伴随介词、受益介词、对象介词、并列连词等，例如：（引自石汝杰（2006））^[28]

- (41) 哥哥也弗许听个嫂同床。（伴随）
- (42) 隔河看见野花开，寄声情哥郎听我采采来。（受益）
- (43) 使尽机谋凑子我里个郎，听个外婆借子醉公床。（对象）
- (44) 郎啊，我听你并胆同心一个人能介好。（并列连词）

随着“搭”的功能的逐步发展，多功能虚词“听”被淘汰了。

苏州话“搭”的演变过程可以总结如下：

“连带、连同”义动词>并列连词/伴随介词>受益介词/等比介词

“搭”在苏州一带方言中发生语法化之后，又伴随着苏州话的影响力扩散到了上海等其他吴语当中。林素娥（2015）考察发现，早期上海话传教士文献中多用“脱/忒”，大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搭”的形式；^[16]她还发现，“搭”的出现，正好与极性问标记“阿”进入上海话的时间相似，这主要是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恰好是苏州话影响上海话最剧烈的时期。^{[15]182}在上海郊区的嘉定、崇明、松江等地的方言中，至今仍然还是以用təʔ⁷为主，^{[34]184, [48]179-180, [44]}这正好与上海早期文献中的“脱/忒”（上文已经提到可能是“替”的促化）相一致，也说明təʔ⁷类是上海地区方言的早期形式，“搭”虽由苏州话传入了上海市区，但还没有完全扩散到上海郊区。

3.2 宁波话“搭”的来源及其语义演变

上文2.2节已经指出，宁波话的“搭”早期读音是teʔ⁷/təʔ⁷，后来随着宁波话eʔ/əʔ、aʔ两韵合并为eʔ而读成了teʔ⁷。那么宁波话“搭/得”的来源又是什么？

宁波话用“拨”表示给予动词、允让动词和被动标记，用“搭”表示受益者标记、伴随者标记和并列连词等。而旧慈溪^{三七市}和象山^{丹城}，则是用“得”表示宁波话“拨”和“搭”的所有功能。先来看旧慈溪^{三七市}，“得”təʔ⁷是该方言的给予动词，同时还具有被动标记、处置标记、受益者标记、受损者标记、伴随

者标记、言谈对象标记、等比对象标记等介词用法以及并列连词功能,例如(引自阮桂君(2009)):^{[26][273-275]}

- (45) 葛支笔得我仔嘴。这支笔给我了。(给予)
- (46) 我得伊刮勒两个耳光。我被他打了两个耳光。(被动)
- (47) 莫得人家东西弄坏。别把人家的东西弄坏。(处置)
- (48) 我得诺梳头。我给你梳头。(受益者)
- (49) 东西莫得人家弄坏。东西不要给人家弄坏了。(受损者)
- (50) 萝卜得肉聚头滚滚渠。萝卜和肉一起煮一煮。(伴随者)
- (51) 葛事体诺事先应该得渠讲清爽。这事你事先应该跟他讲清楚。(言谈对象)
- (52) 儿子得阿爹一样长嘴。儿子和爸爸一样高了。(等比对象)
- (53) 我有眼色盲,红得绿老老要看错。我有色盲,红和绿经常要看错。(并列连词)

再来看象山丹城,叶宗正(2011)指出,象山丹城话的“得”te?既具有给予动词的用法,又是一个多功能的虚词。^[45]这与旧慈溪三七市的情况非常相像。根据笔者的调查,象山丹城的“得”除了具有给予动词、允让动词的用法,还具有被动标记、处置标记、接受者标记、受益者标记、受损者标记、伴随者标记、言谈对象标记、等比标记等介词用法以及并列连词功能,例如:

- (54) 得渠一本书。给他一本书。(给予)
- (55) 我借得渠一百块钞票。我借给他一百块钱。(给予)
- (56) 司机得渠落车。司机不会让他下车的。(允让)
- (57) 我得渠打了一顿。我被他打了一顿。(被动)
- (58) 渠得碗打破碎咿。他把碗打破了。(处置)
- (59) 送本书得渠。送本书给他。(接受者)
- (60) 我得渠开门。我给他开门。(受益者)
- (61) 自行车得渠我弄坏咿。自行车他给我弄坏了。(受损者)
- (62) 我明朝得渠一道去嬉。我明天跟他一起去玩。(伴随者)
- (63) 我得渠讲:明朝我弗去。我跟他说:明天我不去了。(言谈对象)
- (64) 我得渠一样大。我跟他一样大。(等比)
- (65) 我得小王统是浙江人。我和小王都是浙江人。(并列连词)

上文 2.2 节中已经指明,宁波话的“搭/得”早期读 te?或 ta?,且与旧慈溪、象山等地的“得”同源。由此可以认为,早期宁波话的“搭/得”也是给予动词,其各类介词用法都是从给予动词发展而来,宁波话“搭/得”的演变过程可以总结如下:



盛益民(2010、2015)已经证明,浙北绍兴等地的多功能词“拨”并非原生的,而是来自于其他方言的影响。^[30, 32]我们认为宁波话的情况与其类似,“拨”也是外来的。给予动词“拨”进入宁波地区之后,取代了“得”原有的给予动词、允让动词、被动标记等功能,于是形成了宁波话“拨-搭/得”

功能分化的局面。

在北部吴语,多功能虚词“得”除了分布于甬江小片,还分布于临绍小片的富阳、旧新登(今富阳新登)、诸暨、嵊州等地的方言中。如诸暨五泄话用“接 te?得”表给予,用“得”te?表被动标记、受益者标记、伴随者标记、言谈对象标记和并列连词等,例如:

- (66) 我接得渠一本书。我给他一本书。(给予)
- (67) 我得渠敲得一记。我被他打了一下。(被动)
- (68) 我得渠开门。我给他开门。(受益者)
- (69) 我得渠凑队去游泳。我和他一起去游泳。(伴随者)
- (70) 渠得我讲:明朝要落雨。他跟我说:明天要下雨。(言谈对象)
- (71) 我得渠统口[ka?]是诸暨人。我和他都是诸暨人。(并列连词)

而富阳春江话的“得”te?只有伴随者标记、言谈对象标记和并列连词等功能,给予动词等也是用“拨”,例如(引自盛益民、李旭平(2018)):^{[33][277, 319]}

- (72) 我得渠一道游水去。我跟他一起去游泳。(伴随者)
- (73) 尔拨我得渠讲一声,我来寻渠过。你给我跟他说一声,我来找过他了。(言谈对象)
- (74) 我小学得初中都灵桥读。我小学和初中都在灵桥读的。(并列连词)

旧新登、嵊州鹿山等地的情况与此类似。

我们认为,富阳、旧新登等地的情况跟宁波一样,“得”早期表给予动词、被动标记和受益者标记等功能也都被“拨”取代了。“得”在北部吴语各地的功能差异,可以归纳为下表:

表 2 北部吴语各地多功能词“得”的功能比较

	给予	受益者标记	命令标记	伴随者标记	并列连词
慈溪三七市 象山丹城	得	得	得我	得	得
诸暨五泄	接得	得	得我	得	得
宁波	拨	得	得我	得	得
富阳春江	拨	拨	拨我	得	得
富阳新登	把 pa ³	把 pa ³	把 pa ³ 我	得	得

除了北部吴语,“得”还分布于南部吴语的婺州片中,如金华方言的“得”ta?可以表示给予动词和被动标记,东阳方言的“得”tei?和开化方言的“得”ta?也有类似的功能,例如:

- (75) 渠得我依十块钞票。他给我十块钱。(给予)(金华)^[11247]
- (76) 鸡得贼偷去了。鸡被贼偷去了。(被动)(同上)
- (77) 侬个碗得渠口[sΛ³³]破。那个碗被他打破了。(被动)(东阳)^{[23][117]}
- (78) 得我一本书。给我一本书。(给予)(开化)^{[31][447]}
- (79) 口[e²¹]个瓯得渠捶破。那个碗被他打破了。(被动)(同上)^{[31][458]}

可见,多功能词“得”在浙江吴语中具有广泛的分布,最初表给予动词,被动标记、受益者标记、

伴随者标记、并列连词等各类虚词的用法都是从给予动词发展而来。宁波一带由于语音合并加上部分功能为“拨”所替代，才出现了“得”与苏沪吴语的“搭”偶然同音、同义的现象。

至于浙江吴语中“得”的语源，张敏（2011）认为其来历不明。^[50]其或许来自于取得义的“得”，或许另有来源，需要进一步研究。

4 结语

通过考察分析，我们认为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的多功能虚词“等”并非从给予动词或者等待义动词“等”发展而来，而是传教士文献中的另一个多功能虚词“搭/得”增生鼻音尾的结果。最初的宁波话“等”与“搭/得”是并存的，在现今的宁波话中，“等”已经被淘汰了。“搭”与旧慈溪三七市、象山丹城乃至诸暨、富阳、嵊州等地方方言中的“得”有同源关系，其多功能虚词的用法是从给予动词发展而来的。

宁波吴语的“搭/得”与苏沪吴语的“搭”并没有语源上的关系，两者只是偶然同音而已。苏沪吴语的“搭”由“连带、连同”义动词发展而来，之后又从苏州话扩散到了上海话等其他吴语当中。而宁波的“搭/得”由给予动词发展而来，与苏沪一带来源于“连带、连同”义动词的“搭”并非同一个语素，宁波话中的“搭/得”与苏沪一带的“搭”只是因为语音演变而导致的同音，是偶然现象而已。

本文的研究除厘清了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多功能虚词“等”的来源、苏沪和宁波多功能虚词“搭”的非同一性外，还有另外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个方面，在汉语语法化以及虚词考源的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音义互动的复杂性，尤其应该重视虚词的特殊音变。除了文献中常见的语音弱化之外，还应该发掘更多类似的特殊音变模式，如本文提到的增生鼻音就是一种重要的特殊音变模式。利用增生鼻音，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不少汉语史和汉语方言中的问题，如汉语史中复数标记“们”的鼻音尾问题、不少汉语方言中语气词读阳声韵的问题等。当然，语法化过程并不必然伴随语音的改变，因此在进行虚词考源时，如果发现特殊音变，必须进行详细论证，以避免利用特殊音变解释的随意性。同时，还要认识到虚词的特殊音变也有其内在规律性，如附注⑨提到的北部吴语读入声的虚词或高频词，增生鼻音后一律读成阴上调，这就是一种规律的体现。另一个方面，在进行共时方言语法和利用比较方言学的方法研究方言语法史的过程中，需要重视语素同一性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同一个方言区内语音对应、功能相当的成分，常常是同源的，然而对于像吴语这样内部语法差异巨大的方言区来说，可能并不是这么简单，如盛益民（2013）指出南北吴语的复数标记“拉”la⁰仅仅是同音而已，^[31]本文也证

明宁波话的“搭”与苏沪地区的多功能虚词“搭”只是偶然同音。

附注：

①本文的国际音标一律不加[]。单音节词一律标调类（1 阴平、2 阳平、3 阴上、4 阳上、5 阴去、6 阳去、7 阴入、8 阳入），多音节词一律标调值。传教士文献中的标音符号一律用斜体表示。此外，为了便于阅读，对虚词所使用的同音记音字一律不加^ˊ。

②本书根据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1847-1901）的遗稿整理而成，于1910年出版，所代表的语言实际要早于穆麟德去世的1901年。

③即便是邵东等地“等”表给予动词用法的来源，也需要再讨论。王健（2017）认为它是由另一个多功能虚词“把”类推所产生的。^[36]当然，由于邵东周围有不少地区给予动词为“得”，鼻音增生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解决途径。

④关于由允让义动词发展到被动标记的具体演变过程，Yap & Iwasaki（2003），^[58]洪波、赵茗（2005），^[11]张丽丽（2006）^[49]等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可参看。

⑤江蓝生（2012）认为存在“使役动词>伴随者标记”的演变。^[13]不过在张敏（2008）、^[51]张定（2010）^[47]和盛益民（2015）^[32]关于介词的概念空间中，“使役”与“伴随”并不相连，因而这一语义演变路径还需要更多证据支持。

⑥除了吴语“拨-本”的例子之外，张敏（2011）还举了部分浙江方言将“拿”读成鼻音尾或鼻化韵的例子。^[50]不过，这些浙江方言对应的成分其本字可能是咸山摄的“担”，未必是“拿”增生鼻音尾。

⑦郑伟（2017）认为松江话的tʰəŋ³来自早期吴语文献中的“听”。^[54]^[210]但是这种观点在语音和语义上都还有些需要解释的地方：语音上，松江话“听”表示听闻义读tʰiŋ¹，表示任凭义读tʰiŋ⁵，与介词tʰəŋ³韵母不同、声调有别，语音上相差较大，这一点郑文已经提及；语义上，早期吴语文献中的“听”只有受益者标记的功能，而松江话的tʰəŋ³还有伴随者标记、并列连词等功能，二者语义上也有较大不同。加之松江话的“听”在共时层面上有舒、促两读，所以虚词增生鼻音的音变可能是更好的解释。

⑧在私人交流时，刘丹青先生认为，一般语法单位的增加都靠音义结合单位的增加而实现。虚词和常用动词增生鼻音的动因是语音层面的，还是句法语义层面的，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⑨陶寰先生提醒笔者，2.1节北部吴语的例证显示，入声韵字鼻音增生之后一律读上声调。宁波话由“搭/得”增生鼻音后的形式“等”也是阴上调，符合浙北吴语鼻音增生的通则。

⑩除了吴语，并列连词“搭”还分布于安徽境内安庆、怀宁、歙县、绩溪四处（据内部铅印本《安徽方言概况》）、云南大部分地区^[140]和湖南益阳方言^[42]等地。这些方言与吴语的“搭”是同出一源，还是平行演变的结果，需要进一步研究。

⑪刘丹青先生、石汝杰先生等认为，“听”很可能是“替”增生鼻音尾的形式。若此，则其与上海一带来自于“替”促化的“脱/忒”也能联系上。

参考文献：

- [1]曹志耘. 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2]曹志耘. 金华方言词典[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 [3]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斋，等.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M]. 东京：好文出版，2011.
- [4]大西博子. 萧山方言研究[M]. 东京：好文出版，1999.

- [5]方松熹. 舟山方言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 [6]龚波. 汉语方言中表被动的“等”及其来源[C]//汉语史研究集刊: 第13辑. 成都: 巴蜀书社, 2010.
- [7]何亮. 方言中“等”字表被动的成因探析[J]. 语言科学, 2005(1).
- [8]何忠东, 李崇兴. 汉语“使役”“被动”规律性演变的方言佐证——汉语方言中的“等”字被动句[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04(2).
- [9]洪波. “给”字的语法化[C]//南开语言学刊: 第2期.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10]洪波, 王丹霞. 命令标记“与我”、“给我”的语法化及词汇化问题探析[C]//沈家煊, 吴福祥, 李宗江.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11]洪波, 赵茗. 汉语给予动词的使役化及使役动词的被动介词化[C]//沈家煊, 吴福祥, 马贝加.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12]胡明扬. 海盐方言志[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2.
- [13]江蓝生. 汉语连-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的路径和类型[J]. 中国语文, 2012(4).
- [14]李小军. 汉语语法化演变中的音变及音义互动关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15]林素娥. 一百多年来吴语句法类型演变研究——基于西儒吴方言文献的考察[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16]林素娥. 一百多年前宁波话连-介词“等”的用法及其来源[J]. 语言科学, 2015(4).
- [17]刘丹青. 吴江方言的代词系统及内部差异[C]//李如龙, 张双庆. 代词.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 [18]刘丹青. 语法化中的共性与个性, 单向性与双向性——以北部吴语的同义多功能虚词“搭”和“帮”为例[C]//吴福祥, 洪波.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9]刘丹青. 《老北京土话语法研究》序[M]//卢小群. 老北京土话语法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20]刘华丽. 汉语“等/待”使役结构历时考察[C]//东亚文献研究: 第14辑. 忠州: 韩国忠州大学校, 2014.
- [21]卢今元. 吕四方言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22]钱乃荣. 上海语言发展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23]秋谷裕幸, 赵日新, 太田斋, 等. 吴语兰溪东阳方言研究[M]. 神户: 神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部, 2002.
- [24]潘悟云. 汉语否定词考源——兼论虚词考本字的基本方法[J]. 中国语文, 2002(4).
- [25]潘悟云, 陶寰. 吴语的指代词[C]//李如龙, 张双庆. 代词.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 [26]阮桂君. 宁波方言语法研究[M]. 武汉: 华中师大出版社, 2009.
- [27]石汝杰. 苏州方言的介词体系[C]//李如龙, 张双庆. 介词.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0.
- [28]石汝杰. 《山歌》的语音和语法问题[M]//明清吴语和现代方言研究.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 [29]石汝杰, 宫田一郎. 明清吴语词典[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 [30]盛益民. 绍兴柯桥话多功能虚词“作”的语义演变——兼论太湖片吴语受益者标记来源的三种类型[J]. 语言科学, 2010(2).
- [31]盛益民. 吴语人称代词复数标记来源的类型学考察[C]//语言学论丛: 第48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32]盛益民. 语义地图的不连续与历史演变——以绍兴方言的虚词“作”“拨”为例[C]//李小凡, 等. 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地图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33]盛益民, 李旭平. 富阳方言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 [34]汤珍珠, 陈忠敏. 嘉定方言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 [35]汤珍珠, 陈忠敏, 吴新贤. 宁波方言词典[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 [36]王健. 从致使动词到“给予”动词——一个逆语法化的实例?[A]. 第四届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 [37]王双成. 汉藏语言的鼻音韵尾增生现象[J]. 民族语文, 2014(5).
- [38]汪化云. 黄孝方言语法研究[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16.
- [39]吴福祥. 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兼论SVO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两种演化模式[J]. 中国语文, 2003(1).
- [40]吴福祥. 汉语方言中的若干逆语法化现象[J]. 中国语文, 2017(3).
- [41]徐波. 舟山方言中的虚词 te^25 [J].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04(4).
- [42]徐慧. 益阳方言语法研究[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 [43]徐通锵. 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C]//语言学论丛: 第16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44]许宝华, 陶寰. 松江方言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 [45]叶宗正. 象山方言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46]袁丹. 汉语方言中的鼻尾增生现象[J]. 语文研究, 2014(3).
- [47]张定. 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图视角[D].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博士学位论文, 2010.
- [48]张惠英. 崇明方言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49]张丽丽. 汉语使役句表被动的语义发展[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6(7).
- [50]张敏. 汉语方言双及物结构南北差异的成因: 类型学研究引起的新问题[C]//中国语言学集刊: 4.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51]张敏. 空间地图和语义地图上的“常”与“变”: 以汉语被动、使役、处置、工具、受益者等关系标记为例[R]. 南开大学学术报告, 2008.
- [52]赵川兵. 试从“句位扩散”看吴语连词“搭”的来源[C]//语言学论丛: 第41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53]赵元任. 现代吴语的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1928.
- [54]郑伟. 吴语虚词及其语法化研究[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7.
- [55]郑伟. 吴语早期文献所见的“等”字句[J]. 中国语文研究, 2007(2).
- [56]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57]Hilary Chappell (曹茜蕾). Reanalysis of analytic causative and passive constructions in Sinitic languages with source verbs of giving and waiting[R].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术报告, 2015.
- [58]Yap, Foong-Ha & Shoichi Iwasaki. From causatives to passives: A passage in som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C]//Eugene H. Casad & Gary B. Palmer.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Non-Indo-European Languag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3.

(责任编辑 曹瑞芳)